

近代中国科学家

沈渭滨●主编



JIN DAI ZHONG GUO KEXUE JIA

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沈渭滨 主编

近代中国科学家

蒲溪生 杨勇刚 编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43862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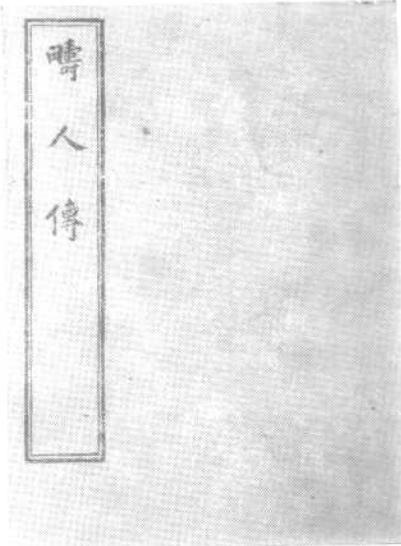
1143862

责任编辑 朱金元
封面装帧 王申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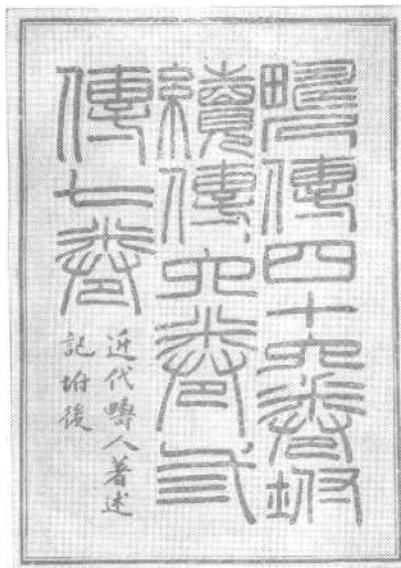
沈渭滨 主编
近代中国科学家
蒲溪生 杨勇刚 编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 54号)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东张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8.5 插页 5 字数 194,000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5,000
ISBN 7-208-00297-5/K·70
定价 2.6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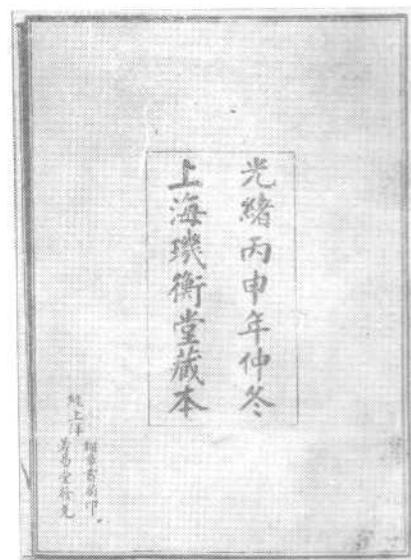
颐性老人像



《畴人传》封面



《畴人传》书名页



《畴人传》版权页



顾观光部份著作(稿本与刊本)



顾观光《武陵山人遗书》封面及总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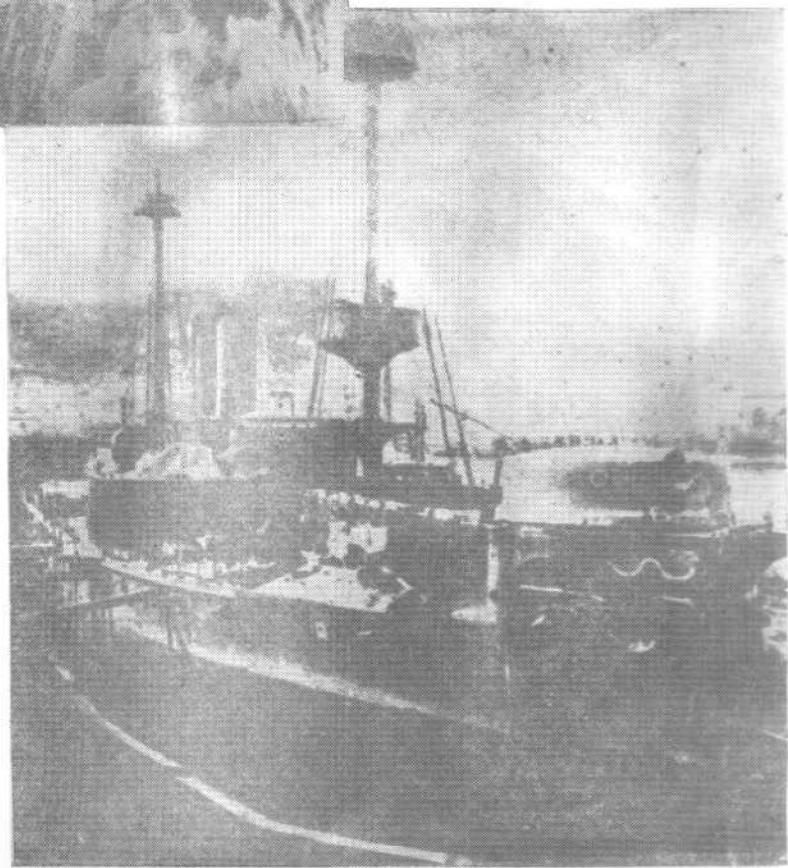
繙譯處



徐壽(中)徐建寅(左)華蘅芳(右)合攝于江南機器製造局翻譯處



许景澄遗像



「鎮遠」号兵舰



詹天佑遺像



冯如遺像

下學盒算術

趙之琛書

项名达《下学盒算术》封面

镌于冯如墓碑的大总统令



前　　言

DC27/24

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。优秀的科学技术家是全社会、全民族的骄傲。他们创造的成果既是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，又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。

中国有着辉煌的科技成就。当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，中国就已经以精美的石器与青铜器显示了自己的文明和进步。直到十五世纪初叶，中国仍保持着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。郑和下西洋时的船队，无论在船舶制造、航海技术和导航仪器等方面，都令世界咋舌。十五世纪中叶以后，中国的科学技术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。到十九世纪中叶，除了数学中某些分支还有若干优势之外，一切方面都只有对往昔光辉的深情怀念，拿不出什么可以自豪的成果了。原因种种，但最根本一条是封建制度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的漠视。

正是这个原因，决定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。近代中国科学家们，在既无国家支持奖掖，又乏必需设备条件的困境之下，凭着冀民族自立、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，顽强刻苦地研求探索，在以数学为首的许多学科中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。他们的奋斗史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；他们的成就虽与西方先进国家同类成果相比还有差距，但仍然值得后代珍惜。

自从明末西方传教士挟带零星的科技知识进入中国以后，中国的科学技术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。清初，由于统治者外而闭关，内而高压，这一过程有所中断，中国学者较多地转向古代数学和科技典籍的整理研究。近代以来，随着西学的逐步传播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渐次变异，被视为“淫技奇巧”的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重又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过程。所以，近代科技史的发展是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步的。但这决不等于说，中国的科学技术只有模仿和照搬西方，恰恰相反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在缺乏充分资料和设备情况下，通过独立研究而达到了类似西方学者做出的结论。有的则明显地具有独创性。因此，近代科技史既有学习西方的一面，又有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一面。这一点，在近代数学史上尤为明显。

本书选择了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植物、医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地质、造船、铁道、飞机设计、兵器制造和水利建设等十三个方面二十余位科学技术家，分别立传。每传五千字至一万五千字不等。除了上述这些科学家之外，其他在科技史上相当有成就但因缺乏资料而不能成篇的，只好割爱。

这些传记，虽然篇幅不大，但写来亦颇为艰苦。一是传主资料不多，著作难于搜求，往往为寻找材料奔波于各个图书馆之间，旷日费时而所获无几；二是作者并非科学技术专门家，为了弄懂其中科学原理、定理、公式、术语，需要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，除向书本求得知识外，有时还得请教有关学者、专家，弄明白了才敢提笔作传。所以，不少传记数易其稿，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，合得上古人所说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的诗句了。当然，这些传记仍很粗糙，问题和缺点在所难免，还望专家、读者多多指正。

作者们在成稿过程中，曾吸取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；书中

若干篇数学家传记，承林厚伦同志提出宝贵意见，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。

沈渭滨

1986年4月于复旦大学

目 录

[1]	前 言	沈渭滨
[1]	郑复光	陈祖恩
[10]	罗士琳	戴鞍钢
[19]	吴其濬	于伯铭 冯士钵
[29]	项名达	李 磊
[38]	顾观光	陈建领
[47]	徐有壬	杨勇刚
[59]	丁拱辰	夏林根
[68]	龚振麟	夏林根
[74]	丁守存	石柏林
[80]	张福僖	王锦光 余善玲
[86]	戴 煦	孙国群 戴鞍钢
[97]	王士雄	洪丕谟 姜玉珍
[106]	丁取忠	曹 朔
[113]	李善兰	杨勇刚 王少普
[125]	汪曰桢	于伯铭

-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[136] | 徐 寿 | 冯士体 | 于伯铭 |
| [151] | 华蘅芳 | | 夏林根 |
| [160] | 李凤苞 | | 姜 鸣 |
| [168] | 杨守敬 | | 杨正泰 |
| [179] | 徐建寅 | 于伯铭 | 冯士体 |
| [190] | 魏 瀚 | | 林庆元 |
| [200] | 詹天佑 | | 杨勇刚 |
| [219] | 张相文 | | 杨正泰 |
| [233] | 章鸿钊 | 冯士体 | 于伯铭 |
| [244] | 李仪祉 | | 李正义 |
| [254] | 冯 如 | | 夏林根 |

郑 复 光

中国“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，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”。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“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，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”^①。这是著名科学史家、英国人李约瑟(Noel Joseph Needham, 1900—)在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时说的一段话。他的评价是公正的。

我国古代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世界所公认。中国古代不仅涌现过大批杰出的科学家、发明家，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。但是，由于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思想诸方面的原因，自十五、十六世纪以后，我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，并且差距越来越大。尽管如此，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，还是出现了不少著名科学家，取得了许多重要科技成果。郑复光就是十九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我国有成就的几何光学专家。

郑复光，字元甫，一字瀚香，又字浣香。一七八〇年(乾隆四十五年)出生于安徽歙县西张龄桥。郑复光自幼性格沉默，颇好深思。少年时入家塾读书。他的老师吴鏞，歙县昌溪人，平时好客慷慨，为乡亲邻里所尊重，文人学士也多乐与交往。郑复光对

^① [英]李约瑟著：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翻译小组译：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一卷，第一分册，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，第三页。

其不仅尊敬仰慕，而且怀有深厚的感情。稍长，他以监生入北京国子监就读^①。那里学习条件优越，郑复光又好学刻苦，学业大有长进。他广泛阅读，勤于思考，对“四元、几何，中西各术，无不穷究入微”^②，在平面几何学方面有较大的兴趣，特别喜欢摆弄和探究各种光学器具。

青少年时代的郑复光，曾随父亲到过扬州古城，后又游历广东、云南、陕西、山西等地。这使他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。当时的广州是中西货物交流的唯一口岸，郑复光得以接触到许多西方传入的工艺品。广州的制镜业较发达，有不少加工制作工场和出售各种镜物的商店，还有名闻全国的所谓“眼镜街”。他在广州收集了测量高仪镜（俗名“量天尺”）等光学仪器^③，为了解其光学原理和制作方法，他还虚心向店铺师傅请教。

郑复光为探究光学奥秘，不仅努力从书本上寻求知识，而且还很注重实验。一次，他读到西汉人所写的《淮南万毕术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削冰令圆，举以向日，以艾承其影则火生。意思是说，取一块洁净的冰，将其削成球形状，制成一面凸透镜，用它对着太阳，使阳光折射而会聚于一个焦点，再把艾草放在焦点光影上，艾草便会发火。冰遇热会溶化，但经加工后则能聚焦生火，这究竟可能吗？为了证明这一点，郑复光于一八一九年（嘉庆二十四年）冬天亲自做了实验。他用一把凹底的大锡壶，将一块半径约为一尺七八寸的冰磨成双面凸起的冰透镜，然后把冰

① 桂文灿：《经学博采录》，转引自林文照：《十九世纪前期我国一部重要的光学著作——〈镜镜冷痴〉的初步研究》（以下简称《〈镜镜冷痴〉研究》），《科技史文集》第十二辑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，第一一九页。

② 石国柱、楼文钊合修，许承尧等纂：《歙县志》卷十，《人物志·士林》一九三七年歙县旅沪同乡会铅印本，第二十页。

③ 郑复光：《镜镜冷痴·述作》，转引自林文照：《〈镜镜冷痴〉研究》，《科技史文集》第十二辑。

透镜支架在方桌上，使它面对太阳，再在聚焦点下放一张薄纸，不一会儿，纸上便冒出了一股青烟，由此证实了削冰取火的记载确凿可靠。通过实验，郑复光初步领悟了光学原理，并详细记录了冰透镜的制法及实验经过。

多年在外学习、游历，郑复光结识了许多朋友。过从较密的有著名经世学家包世臣、学者程恩泽等。包世臣，字慎伯，号倦翁，别号小倦游阁外史。安徽泾县人。嘉庆举人，曾官江西新喻（今新余）知县。擅长书法、文章，尤以经世之学闻名于时。他与郑复光“相习数十年”，感情笃厚，对郑复光立意讲求实学有较大影响。程恩泽，字云芬，号香海，安徽歙县人。一八〇四年（嘉庆九年）应乡试中举后居住京师。一八一一年（嘉庆十六年）成进士，曾为国子监祭酒（国子监主官），后累迁至工部、户部右侍郎。程恩泽学识超于时俗，诗文雄深博雅，对研制天文仪器有较浓厚兴趣。他曾感叹“近人治算由《九章》以通四元，可谓发明绝学，而器制无传”。后来，他约请郑复光一起修复古代仪器^①。中国古代有一种测量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，名曰“晷”，通常由一块石板制成，中央凿有一个较深的圆孔，以立一根圆柱，圆孔之外刻有一个大圆，并在圆周间隔均匀地标明度数，当太阳光照射圆柱时，即可根据其投影确定各该时刻。但他们发现齐太守彦槐创制的一种晷，“自午初至未初（约十一点至十三点）无景，是一大病”，经两人共同加工修缮后，弥补了这一缺陷^②。

约在一八二四年（道光四年），郑复光与友人再次游历扬

^① 石国柱、楼文钊合修，许承尧等纂：《歙县志》卷七，《人物志·文苑》第二十六页。

^② 程恩泽：《程侍郎遗集》，《面东西晷铭》，转引自林文照：《〈衡情吟痴〉研究》，《科技史文集》第十二辑，第一二〇页。